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

童开沅著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

章开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

章开沅 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25 字数415千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510—8 / K · 38 (平)

印数：1—1 500 定价：9.80元

ISBN 7—5622—0553—1 / K · 45 (精)

印数：1—500 定价：12.95元



作 者 近 照

自序

研究辛亥革命史，对我来说，多少有些出于偶然，因为我的兴趣本来在于太平天国。记得是在1954年秋天，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史作调查研究，我随同姚薇元、汪诒荪两位前辈学者参与了接待工作。这件事对我颇有刺激，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趣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以为情。同时，由于在接待过程中与熊秉坤、李春萱、李西屏等一批辛亥老人朝夕相处，他们娓娓而谈的许多往事也迅速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

但真正把辛亥革命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那还是在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后。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我有机会向黎澍等前辈学者请教，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检阅了一部分较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感到辛亥革命史真是一个相当广阔的领域，课题简直俯拾皆是，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不仅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前辈学者的指点与鼓励，而且还结识了一批才思横溢、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从此我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共同在辛亥革命这块园地辛勤耕作。20多年来，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曲折，我们的友情和我们的工作一样，相互切磋，相濡以沫，可以说数十年如一日，这是人生最大的安慰。

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我的幸运不仅是在国内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而且在1978年以后又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辛

亥革命史研究者结成深厚的友谊。我们有共同的旨趣和共同的语言，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使辛亥革命这个年轻的史学分支，在短短10年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竟使举世为之瞩目。同时，我的幸运还在于我曾有机会与我的研究对象直接对话甚至共事，其中包括在全国政协共同搜集北洋史资料达两年之久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包括视我如世交子弟的章士钊先生，我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还应该提到，由于我的研究范围涉及面较广，又使我在国内外结识一大批近代中国历史名人的后裔，从容閔、严复、张謇一直到孙中山、黄兴、居正、吴禄贞、官崎滔天……，他们的亲属都对我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前辈与友人的指教与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是很难取得多少成绩的。

然而，在本书出版之际回顾以往的工作，我又充满了遗憾与内疚。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我和其他学者一样，失掉的时间太多太多。同时，由于我的资质鲁钝，少年失学和勤奋不足，所取得的成果又太少太少。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水平远远不能符合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我的殷切期望。有些年长学者心甘情愿充当人梯，我则是从来不敢以人梯自喻，因为痛感自己在学术上缺少应有的高度。常见有些学者给自己的文集冠以辉煌的名字，我则常想把自己的著作称之为《侏儒集》、《恒订集》、《敝帚集》或《汗颜集》。这并非故作谦抑，而是多少有点自知之明。近10年来，我曾4次访问美国，平时也经常与美国学者交往，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我却至今不愿学也无法学，那就是某些美国学者习以为常的自我吹嘘。我总觉得，对科学成果的评估，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应该采取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用市场商贩叫卖的办法来推销自己的著作，对于真正的学者毕竟是不可取的。回顾平生，至少有一点可以自慰，即从来没有自动以混日子蹉跎岁月，在最后离开工作岗位以

前多少还给社会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同时，经过我们这代人培育成才的年轻一代学者，正在新的起点与新的水平上奋力进取。他们的机遇与主客观条件都胜过我们，理应取得比我们更大的成就。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我们羡慕他们，但毫无忌妒之心，他们的成绩就是我们的欢悦。未来总是属于青年，我们的希望也正寄托于青年。

收于本书中的有些文章是早年习作，如《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等；有些则是写作于“文革”刚刚结束，如《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这些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历史的局限，同时也有个人学力不足以及论析粗疏之处；为保存原貌，除个别字句外，一律未加改动，以便后学者了解我的认识发展轨迹。此外，本书还收入一些编辑说明与序言之类的短文。我平素不愿轻易为人作序，但既经许诺就总想言之有物，写点自己读后的心得或借此想讲的话，同时也多少提供一些有关当代史学的背景材料。有些年轻人不耐烦看我冗长的论文，却喜欢读我写的某些序言，特别是为若干外国学者著作中译本写的序言，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最后，需要说明，黄怀玉同志为此书做了大量搜集、整理、校核工作，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是很难及时出版问世的。

本书责任编辑李晓明同志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我的同事与学生朱英、王杰、马晓泉、郭国灿、周宏宇帮助我认真校对全书，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期待着海内外读者的批评。

章开沅

1988年深秋于桂子山

目 录

自序	(1)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	(17)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35)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	(44)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	(53)
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	(70)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	(111)
论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思想的特征	(121)
论国魂	(132)
国魂与国民精神试析	(140)
“排满”与民主运动	(155)
论1903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	(166)
孙中山与中国国情	(188)
孙中山与世情	(196)
从离异到回归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210)
辛亥革命后的黄兴和江浙立宪派	(232)
谭人凤与社团改进会	(239)
孙中山与宫崎兄弟	(246)

只教文章点点血，流作樱花一片红	
——宫崎滔天与中日友谊	(255)
宫崎寅藏与《革命评论》	(259)
对于张謇的再认识	(267)
张謇与中国近代化	(279)
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	(294)
张謇与中法劝业银行	(310)
辛亥革命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	
——介绍部分张謇未刊函电	(320)
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	(331)
民元“争都”浅释	(353)
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	(369)
辛亥武昌首义记	(394)
湖南人与辛亥革命	(401)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总序	(412)
应该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讯》发刊词	(422)
《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编辑说明	(425)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出版说明	(428)
《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前言	(430)
《章太炎思想研究》序言	(433)
《邹容陈天华评传》序言	(435)
《陈英士》前言	(437)
《张之洞评传》序言	(441)
《唐继尧评传》序言	(446)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前言	(449)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译本序言………	(452)
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学——比较史学研究》	
中译本序言……………	(455)
“不打不成相识”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译本	
序言……………	(459)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读后感……………	(462)
《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序言……………	(471)
辛亥以前康有为、梁启超等致柏原文太郎等的13封信	
注释……………	(473)
辛亥严复致陈宝琛书注释……………	(483)
赣宁之役史料摘要……………	(485)

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又复引起注意和讨论，这对于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因为，自从1954年胡绳同志倡导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理应根据理论学习新的收获，科学的研究新的成就，以及我们自身由于社会、政治阅历增长而有所提高的史识，对中国近代史全过程重新作一番总体考察。底下，也谈谈我个人的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师友。

—

尽管出现了种种争论，但有一根本之点至今仍然为绝大多数学者所坚信不疑，即：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以作为真正动力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为了澄清某些对于阶级斗争片面的、狭隘的误解，或许应该重温一下恩格斯在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

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时隔一个世纪，恩格斯这段话更加令人信服，因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世界各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文明史检验了这个规律，而且获得了许许多多辉煌的科学成果。

但是，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作为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历史中又各自有其千差万殊的具体特点和表现形式。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决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这一人所共知的结论，而是应该着重探索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奴隶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农奴与地主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是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那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线索就很难作出这样简单明瞭的概括。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它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属于过渡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各种因素新旧杂陈，流变不居，民族关系与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大大增加了辨析条理基本线索的难度。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没有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譬如，大家经常引用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便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有其他的论述，如从经济上谈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障碍，从政治思想上谈及向西方学习的几代人物，以及对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精辟分析等等。但相较之下，我总觉得不如有关“两个过程”概括得那么全面与精炼，而且它还可以把后面那些内容涵盖其中。当然，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写于抗日战争前期，上述“两个过程”又主要是为了强调我们民

族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所以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表述似乎还有未尽之意。我想，如果把上述“两个过程”的文字改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也许会使人感到更为完整一些。

一提阶级斗争或“两个过程”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有些朋友就唯恐漏掉经济与文化，唯恐出现简单与片面的毛病。这种担心似有所据，但理解则未必准确。因为，过去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简单片面的毛病，主要是由于“左”的干扰，所谓“突出政治”、“抓纲上线”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由于我们自己研究进展的局限，也容易产生对于“两个过程”比较狭隘的理解。总之，问题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本身，或者“两个过程”的提法是否不妥。我认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在表述上只能是本质性的高度提炼概括，它决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社会历史内容的各个方面缕陈无遗。作为阶级社会历史基本线索的阶级斗争，就其社会根源和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而言，自然可以包容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本文从一开始便特地引用恩格斯那段论述，就是为了强调需要对阶级斗争这一概念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它看成是游离于经济、文化之外的仅仅是涉及政治的暴力行动。

对于“两个过程”也应作如是观。“两个过程”作为阶级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具体体现，它也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自然是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史事的理论概括；“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何尝又只限于群众自发斗争、民族战争和革命运动，它同样也包容着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斗争。

“两个过程”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它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历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很难设想，如果撇开“两个过程”，抽

掉这个基本线索，怎么可能客观、准确、深刻地叙述和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停留于前人已有的结论，需要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包括对基本线索的理解）。认识永无止境。即令是业经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前人结论，也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复进行新的探索、剖析、验证，这样才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学科内容。

由于学力和精力两方面的限制，本文仅从民族运动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略作阐明，或可当作我对于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再认识。

二

纵观世界，几乎每个国家进入近代都曾经历过一次或大或小或盛或晦的民族运动。有些是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有些是在某个先进的民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又产生了国内若干“被排挤民族”起而反抗统治民族的民族运动，还有则是范围更为广泛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与反对本国前资本主义落后统治结合起来的民族运动，一般称之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属于第3种类型。

列宁说：“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①所谓“彻底战胜”，自然是指世界全体和整个时代而言，并非说任何国家、任何阶段的民族运动都能完成“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譬如在中国，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完成的，而且完成得比一般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更为彻底。因此，无论是就中国近代史整体着眼，或是仅仅就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着眼，西方模式都不能简单地搬用于东方。中国和亚洲、非洲、拉

^①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页。

丁美洲其他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风貌，当然这也丝毫无损于上述列宁论断的普遍指导意义。

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因为，民族运动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物，因而也就体现了“两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可避免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也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引起与此相应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变化，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运动逐步具有近代的特征。当然，从帝国主义本性而言，它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促使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体行动还是与封建主义相互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我们民族的每一点进步，都得经历多少次严酷的斗争，都得付出沉重的血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火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何况这酒浆中还混杂着那么多苦涩的味道。在近代中国，不仅每一次民族战争，而且每一次农民战争，每一次革新和革命，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反帝相联系，并且作为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对立物而存在。如果离开这个特点，简单地把中国近代史纳入英、法等国那种独立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衰亡的框架，是不可能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

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以1900年为界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有限，这个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而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和革新派，以及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民族运动带有较多封建落后的因素。1900年以后的民族运动则具有

①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更为明显的近代特征。尽管农民仍然是主要的社会基础，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日渐增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起了指导以至领导的作用。运动不仅包含更多近代内容，而且采取更多近代形式。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虽然它是由地主阶级抵抗派领导的，而且主要限于沿岸地区，但作为一次粗具规模的民族战争则是显而易见的。它不同于以往历次国内民族纷争，而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抗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并且开始卷入风涛险恶而又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恩格斯早已说过：“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①他还从中国南方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②。恩格斯是从世界全局、时代潮流和历史本质的角度来评析中国人民反抗英国鸦片侵略的正义斗争的。我们在探究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时，正应该以此为榜样。

需要指出一点，古老中华帝国的与世隔绝和落后状态，毕竟不象以往某些西方学者所描述的那样绝对。中国不仅已经建立了悠久而且高度发展的封建文明，而且与近代西方文明也有过两百多年有限的接触。特别是象康熙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对新知的热切追求，以及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逐步兴起，都必然要在学界以至政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鸦片战争把已经进入衰世的封建帝国的腐败彻底暴露于世界，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外面的世界采取闭目塞听、麻木不仁的顽固态度。从林则徐的《四州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表现出有识之士要求了解外在世界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新的救危图存之道的强烈愿望。应该承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当时所能提出

^{①②}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22页。

的最为光辉的命题。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既要反对它，又要学习它；只有学习它的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有效地抗御以至战胜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这个大题目做文章，扣紧这个题目必见成效，背离这个题目或缺少正确的章法则一定遭受挫折和失败。当然，魏源等人只能代表我们民族从朦胧中开始觉醒，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是有限的，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也未能突破华夷之辨、宗庙社稷的传统格局。

太平天国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这本来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①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不同于既往的历次农民战争，它不是简单地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反映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而迅速激化的封建主义与城乡人民群众的矛盾。我把太平天国看作一次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由农民自己发动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其根据正在于此。

由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太平天国未能突破和改变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型和命运，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太平天国不仅需要同地主阶级搏斗，而且还要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交道。因此，他们也面临着“师夷制夷”即学习西方以抗御外侮这样严峻而又复杂的新课题。如果说，洪秀全早先还只限于从基督教义中借取精神武器，那么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则反映了通过国家政权仿行西方先进经济和某些社会制度的主观意愿。所谓“新天新地新世界”，“因有自新之学，用以新民新世”云云，不能单纯作为宗教语言来理解，它确实蕴涵着这次农民战争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